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研究 The Study on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白晋湘, 万 义
BAI Jin-xiang, WAN Yi

摘 要: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历史贡献进行自觉、全面、系统的梳理, 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思路。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40年以来,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在着力构建理论体系、继承修志传统、形成特色健身方式、深化经济效益、强化文化传承、树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做出了历史贡献, 但同时存在学科体系自洽性、学科建设制度性、学科评价标准化和学科管理复杂性等问题, 需要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商合作的方式加以改变。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民族传统体育学; 建设

Abstract: Guided by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s spirit, this paper consciously,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in the new perio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thinking of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 shows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 40 years,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has mad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in efforts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system, inherit the tradition of repairing the sculp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 and forming characteristic fitness modes, deepening economic benefits, strengthening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establish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However, China'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discipline has problems of the self-consistency of discipline system, institution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standardization of discipline evaluation and complexity of discipline manage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be changed by the methods of joint participation and consultative cooperation.

Keyword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识码: A

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2017年11月,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 十九大精神中所描绘

的“一带一路”建设、健康中国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等体育强国的宏伟蓝图, 也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与时俱进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进行学科专业调整, 将民族传统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体育学二级学科, 并于1998年增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 初步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专业体系的雏形^[2]。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在学科简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它是研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群,它以武术、气功、养生以及其他民俗传统体育为研究对象,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并使之发扬光大”^[10]。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历经20余年的发展,其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育强国的宏伟蓝图等新时代的要求出发,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本研究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论与实际出发,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历程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治理思路。旨在不断增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影响力,拓展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对提高人的素质的重要作用,提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发展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深化与发展。

2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历史贡献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初期,由于研究人员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并不十分了解,国外也没有相对独立而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经验所能借鉴,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的研究人员开始自发深入到当地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民族传统体育的资料收集,结合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进行调研工作,逐步明晰了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基本方法、特点、价值及其文化特征等学术探索领域,并由此凝聚了一批热衷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扎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学术研究队伍。2003年8月,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科学分会主办的“东方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在湖南省吉首大学举办,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北京体育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上海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成都体育学院等40多家单位的5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围绕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议题进行了深度研讨,卢元镇教授、袁旦教授和白晋湘教授等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方法与特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创新、民族传统体育的国际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复兴与繁荣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重要性和当代价值^[1]。

2.1 结合本土实际,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

建国初期,我们党和国家对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工作就很重视。1950年,朱德同志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广泛地采用民间原有许多体育形式。”^[29]但是,植根于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和生存的需要,在劳动和斗争中创造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在理论体系建设上却非常薄弱,甚至没有国外成熟的理论体系以借鉴。改革开

放40年以来,诸多民族传统体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本土实际,努力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例如,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运用现代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紧密结合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实践,同时吸收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系统的起源、本质、结构与功能、类型与模式、隔离与传播、冲突与变迁等进行研究,揭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造和发展规律^[2];民族传统体育校本化以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为基础,探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文化认同、社会认同以及国家认同等社会功能及其存在价值,深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途径,促进民族关系和谐^[5];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则从文化整体观、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论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在民族整体文化中与各文化因子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阐释现阶段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生态环境中所体现出的形式、内容及功能^[26]。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经验,试图从文化学、教育学、生态学等多维学科视角构建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是突破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理论基础薄弱瓶颈的有益探索。

2.2 深入乡土中国,继承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修志传统

我国历来有盛世修志的传统,经过2000多年修志历史的传统文化沉淀,由旧志-新志-体育志-民族传统体育志,形成了以民族传统体育事项为主体的体育专门志^[18]。1990年,由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共同编修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历时4年,“基本摸清了中华民族体育的‘家底’。收集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之多,其中少数民族有676项,汉民族体育有301项”^[28]。《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则按照志书“横排纵写”的编纂方式,对球技类、跑跳投类、较力类、武术和养生类、骑射类、舞蹈类、游戏类、水冰雪空中类、棋牌类九个类别100余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并将田野调查、文物古迹、文史资料、口述访谈等研究方法交叉融合在一起,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过程中历史转折的社会动因进行了分析,探究了不同地域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演化嬗变的规律^[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志不仅是一种资料的整编,还充分发挥着“存史、教化、资政”等方面的价值与诉求。

2.3 融入全民健身,形成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健身方式

国家及各级地方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族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1995年6月,国务院发布《全民健身计划纲

收稿日期:2018-08-11;修订日期:2018-10-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TY015);国家体育总局民族体育重点研究基地重点课题(16JDZB001)。

第一作者简介:白晋湘,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管理学,E-mail:jsubai@126.com。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湖南吉首416000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416000, China.

要》，条例中明确规定：“积极发展少数民族体育，在民族地区广泛开展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主的体育健身活动。”“挖掘和整理我国传统体育医疗、保健、康复等方面的宝贵遗产，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13]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全民健身条例》，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保障公民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提高公民身体素质”“公民有依法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保障公民参加全民健身活动的权利”。特别是在第十四条中明确指出：“县级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应当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组织开展与农村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相适应的全民健身活动。”第二十七条又指出：“农村地区公共体育设施的规划、建设还应当考虑农村生产劳动和文化生活习惯。”^[12]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体育健身现状不容乐观，如经常参与人群偏低，场地设施建设不足，全民健身工作开展困难，少数民族地区体育工作与当地的生产劳动、文化生活、社会民俗相互脱离等。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体育参与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农忙的时候大运动量的体力负载已经超出了身体承受的极限，农闲期间成为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活动的集中爆发期。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体育场地设施的基础建设，但是这些冷冰冰的全民健身器械，并不能形成群众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众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农耕文化、民族特性等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遗存，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也是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民族传统体育能有效避免现代竞技体育的文化隔阂，也能将地域认同、族群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内化为自己生活的准则，促进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2.4 扩大消费需求，深化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经济效益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指出：“鼓励民族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体育、旅游、休闲等领域联动发展。”^[9]在体育产业迅猛增长的浪潮之中，民族传统体育以独特的魅力成为区域体育产业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比如，“2012年8月，第二届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招商引资项目推介会，共达成合作项目8项，协议投资总额872.55亿元”^[11]。2016年7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了《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3万亿，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比重达到1%，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30%，体育消费额占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超2.5%等”发展目标^[15]，并希望“以武术、龙舟、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为引领，大力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丰富体育产品市场的手段之一，“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提供有力支撑和持续动力”^[22]。所以，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和文化展演，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

是少数民族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追求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效益，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效益边界，增强民族传统体育开发与利用，应该成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战略的关键。

2.5 提升非遗保护，强化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

《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制定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1) 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 传统表演艺术；3) 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 传统手工艺技能；6) 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17]。从民族传统体育事项的身体运动属性而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与民族传统体育直接相关；而如果从“表现形式的文化空间”来说，民族传统体育更为宽广。贵州清水江流域的苗族，每年都会举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龙船节”，届时除了龙舟竞渡之外，还有赛马、斗牛、踩鼓等体育活动；“六月节”是哈尼族的传统节日，哈尼人以秋千代“马”，迎神进寨，转磨秋来驱害除邪；“开斋节”是我国西北地区回、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东乡、保安及撒拉等民族的共有节日。节日期间，大家唱歌、跳舞、叼羊、赛马、套马、摔跤等。此外，还有很多直接用单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命名的节日活动，如壮族“花炮节”、傈僳族“陀螺节”、侗族“摔跤节”、布依族“爬山节”、苗族“赶秋节”等。现在的民族传统体育保护集中于“项目”保护的范畴，忽略了文化空间的存在意义和存在价值，如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就没有对文化空间的范畴进行区分和约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表现形式以及相关的文化空间是一个整体，是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宗教的、民族的、心理的乃至自然的多重因素的综合文化事象。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及其存在的文化空间不仅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应该是全民健身体育工作需要关注和提升之处。

2.6 树立文化自信，谱写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时代篇章

从《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到《国务院办公厅、文化部制定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关规定》，再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体育总局《1995-2010年体育产业发展纲要》，我们不难看出，党和中央政府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事项加以重视，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全民健身、区域经济增长和文化软实力竞争的立足点和着眼点。所以，我们应该从国家战略发展的高度去思考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全民健身、区域经济、文化繁荣紧密结合在一起，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实际出发，开展各项具体研究和实证工作。费孝通先生生前曾说

过:“中国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我为找这条路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做‘文化自觉’这篇文章。”^[7]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一个形而下的、具体的文物实物,而是观念、认识、意识的文化表达。民族传统体育不是已经成为过去时的遗产,而是依然存在于日常生活进行时的传统文化。所以,民族传统体育成为中国“文化自觉”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方式,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增长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文化自觉”要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创新和发展,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走向“文化自信”,进而成为世界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的桎梏

3.1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体系的自洽性问题

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存在,一直颇受学术界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民族传统体育学是一个相对集中的研究领域,还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一个知识领域要成为一门学科,应该具备以下学科标准:1)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2)有相对独立的科学范畴、原理或定律,有正在形成或已经形成的学科体系结构;3)不是单纯由高层学科或相邻学科推演而来,其地位无法用其他学科替代^[14]。除此之外,学科之所以称之为学科,还要聚集一群从事研究、传播或教育活动,有代表性的论作问世,学科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超前性、系统性、严密性,能经受实践或实验的检验或否证。从中国具体的文化语境而言,如何科学地界定“民族”这个族类共同体的内涵与外延,需要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进行唯物辩证,从而形成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自洽性。从中国具体的历史语境而言,作为传统体育项目承载形式的“传统”,是植根于农耕文明的一种亚体育存在形式,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身体表达形式,与西方植根于工业文明的足球、篮球、橄榄球等现代体育运动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差异,所以,不能运用现代体育运动的场地设施、规则裁判、竞赛训练、体育精神去简单类比;从高层学科或相邻学科推演关系而言,作为传统体育项目承载内容的“项目”,将生产生活、传统工艺、宗教仪式、民间音乐、古典舞蹈等要素复合夹杂于一体,虽然可以从哲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宗教学等相近学科吸取营养,但是如果长期以交叉学科的身份作为学科归属依据,最终会造成没有独立学科主张的自洽性问题,也无法实现经典学科标准所主张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体系的“三独立”标准^[24]。

3.2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制度性问题

学科建设制度一般有两种逻辑结构形式,一种以顶层设计为基础,强调自上而下学科建设逻辑的“国家学科制度”;一种以学术话语权为基础,强调自下而上学科建设逻辑

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从“国家学科制度”的逻辑结构形式层面来看,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将民族传统体育学设置为体育学二级学科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依托“国家学科制度”的逻辑,逐步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办学层次体系、课程教学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学术研究体系等,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发展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树立中华民族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的逻辑结构形式层面来看,国内民族传统体育学缺少相应的学术组织机构,从而不能为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学科建设提供定期的、规范的、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更主要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共同体内部没有形成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的问题、方法以及评判的一致性,甚至是知识、方法论和哲学意义上的高度一致性,从而在国内外的体育学术交流过程中缺少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权。正如麦克莱伦(McClellan)所说:“科学是公共知识的一部分,不为个别研究者和先知独享,而是整个共同体的成就和责任。”^[30]

3.3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评价的标准化问题

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全国各地高校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2017年1月27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基于对一流学科的追逐,任何一种学科评估总是在尝试把不可比的东西可比化,把不可量化的事物尽可能地加以量化,此过程充满不确定性。”^[25]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办公室里的铭牌上所写的:“不是一切有价值的都能量化,也不是一切量化的都有价值。”民族传统体育学在国家推进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过程中,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机遇和优势,但不可避免的即将面临着挑战和危机。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和中国科教评价网联合研发和发布了《2016年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研究报告》,根据“一流的队伍、一流的学科、一流的成果、一流的国际化和一流的影响力”的评价标准设立了四个一级指标,而民族传统体育学在师资力量中的高被引科学家、科研能力中的ESI收录论文数、国际合作论文数、发明专利数,教学水平中杰出校友数、进入ESI排名学科数等指标体系上,与其他学科的建设相比呈现较大的差距^[16]。从一流的国际化和一流的影响力的视角而言,民族传统体育学作为我国学科建设中的特色学科,很难在学术话语权上与世界接轨并达成一致。

3.4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管理的复杂性问题

长期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隶属于教育学门类体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进行学科归队和学科管理,这种以教育学为核心的学科归队管理模式,在给高校的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的规格、层次、类型、专业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而明确要求的同时,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桎梏。目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管理涉及的行政组织机构众多,主要有以教育为核心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以全民健身、运动竞技为核心的各级体育行政机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各级文化管理机构,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各级宗教与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等;涉及的行政职能众多,主要包括教育、科技、财政、人事等职能的多主体的联合无缝对接;涉及的学科理论基础众多,除了运动竞赛规则、训练方法、训练手段等之外,还包括器械工艺制作、服装工艺制作、宗教仪式、传统音乐、古典舞蹈等;涉及的权益主体的多元,涉及国家、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传承人、归属地居民等多方利益的划分、调节和统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民众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农耕文化、民族特性等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遗存,具有文化承载的多元性和复合性,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管理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

4.1 以学科创新为方向,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软硬件条件

一个学科的成熟和完善离不开软件(内部)条件和硬件(外部)条件的营造。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虽然在学科条件建设上取得了诸多成绩,也基本符合独立学科的构建条件,但相对于其他的“老学科”而言,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又集中体现在软件(内部)条件的达成上。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软硬件条件在宏观层次方面表现出完备的学科理论体系,特色的理论依托,显著的学科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国际学术界同行的认同等方面的差距最为明显;中观层次主要表现出全国性的学科学术研究组织,全国性教学指导委员会,形成有学科特色的学术研究群体等方面期待完善;微观层次主要表现出相当数量的知名学科带头人,较高研究水准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代表该学科学术方向的专业学术期刊及专业出版机构,系统的课程设置、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升^[27]。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紧扣学科创新的发展方向,将学科发展的重心落在理论体系、特色理论、独立性和同行认同等内部条件的完善上,将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体系建设和中国民族问题、文化问题、民生问题等实际相结合,解决当前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社会组织建设,建立具有学科特色的全国性学术研究组织,

凝聚一批创造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群体,优化学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增强学科发展的后发性力量,攻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理论体系不完善的难题。

4.2 以治理理论为依托,注重民族传统体育社会组织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建设,需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当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管理的行政组织机构众多,但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社会组织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结构的状态,社会组织的积极性、灵活性和创造力没有得以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明确了“政府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对于民族传统学科的发展而言,建立结构化的、体系化的各级各类学术研究型社会组织是当务之急。“社会组织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接政府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使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23]

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社会组织建设,一方面在治理的主体上,打破把政府视为唯一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管理主体的局限,逐步完善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典型项目管理的社会组织,如武术协会、舞龙舞狮协会、龙舟协会等;逐步建立各级各类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学术团体,如武术研究学会、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学会等;逐步形成地方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保护组织,如建立某些濒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习所等。另一方面,在治理方式上,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社会组织与政府行政管理机构之间通过民主协商谈判解决学科发展问题,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要改变权威强制的行政命令方式,以权利主体平等协商的原则,参与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建设中来,凝聚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合力。

4.3 以基层需求为导向,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利用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历史文化沉淀和现实独特表征,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及其民族精神。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此后,又相继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法规通过法律规章的强制性、权威性保障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工作,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教育领域、全民健身领域、旅游开发领域的拓展应用。另一方面,基于“顶层设计”的需要,建立了从上至下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恢复和整理等具体事务进行垂直性管理,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和利用。

以基层需求为导向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利用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注重政策措施的系统性、协同性、操作性、支持力度和统筹整合,对濒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重点保护,通过金融支持政策加大民族传

统体育等珍贵遗产资源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2)注重对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生命状态的生命关怀,完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的表彰制度,对传承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进行表彰和奖励;3)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相关政策,完善民族传统体育的奖励制度、补贴政策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引导和鼓励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的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人通过捐赠、共建等形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研究项目的顺利进行。

4.4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国际合作

2013年9月,习近平同志为推动中国与欧洲、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打开共赢局面,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重大构想,这是全球化和区域化再平衡的重要理论突破。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了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对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4]。作为一项重大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建设,目标是在经济区域合作基础上的文化区域合作,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具体形式和重要呈现,也体现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8]。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民族传统体育学可以构建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推动与各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对接与耦合,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投资和文化消费,创造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需求和就业,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具体表现在:1)强化民族传统体育的多边合作机制;2)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3)拓展民族传统体育表演的交流合作;4)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繁荣发展;5)加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6)加深民族传统体育专家学者的学术资源共享;7)提升民族传统体育国际课题的合作交流^[9]。在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要求的追求之下,增强文化交流与传播,加强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创新发展。

4.5 以健康中国为目标,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幸福感

幸福与健康是人类永恒不变的追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果断而响亮地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号召,明确了大健康观,勾绘出健康中国的建设蓝图^[10]。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核心在于“俗”,是一种“大众化的,最通俗的,习见的”,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所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仍然以“活态”方式存在于民众身边,对民众的习惯、信

仰、生活、心理等产生影响,集地方性知识结构特征和文化价值于一体的身体运动表达。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身体肢体的运动,在历史长河中已经内化为群众有效的健身行为、娱乐方式、生活习惯和集体信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应该借助健康中国2030战略提质飞跃。具体表现在:1)推动体医融合,明确养生类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功效;2)普及全民健身,加强舞蹈类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指导;3)完善公共服务,构建以民族传统体育为核心的“体-养-医”文化圈;4)加强教育传承,构建以民族传统体育为核心的体育校本课程;5)增大经济投入,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健身场地设施;6)健身常态化,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幸福感。

4.6 以生态思维为指针,注重民族传统体育内生环境营造

民族传统体育不是一种纯粹的运动形式,而是民众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农耕文化、民族特性等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遗存。“俗”的文化空间表达成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印痕。民族传统体育学不能局限在项目保护的范畴,单一的项目保护思维会让民族传统体育失去“灵魂”。相比传统的保护思维而言,以生态系统思维为指针注重民族传统体育内生环境营造应该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变:1)民族传统体育学要强调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三种基本关系,打破传统保护思维中注重统治的思维,强调政府与社会、公民的合作关系,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应将满足基层社区居民内在需求作为公共行政政策和公共事务发展的导向,通过政府、社区和公民多方参与、协商共治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从而推动现存制度的变革和创新;2)民族传统体育学科从政府一元化管理模式走向政府、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20],打破单一性的政府管理模式,从满足“顶层设计”需求转向满足“社区居民”需求,加强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私人企业、保险公司和社会团体等之间的合作共治,实现政府、社区、社区居民多方参与的社会资源整合和再分配;3)注重民族传统体育多方权益主体的利益协调。民族传统体育权益主体具有多元性,涉及国家、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传承人、归属地居民等多方利益的划分、调节和统筹,要充分调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拥有者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和积极性。

5 结语

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进行学科专业调整,将民族传统体育学列为教育学门类体育学二级学科,初步建立起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专业体系的雏形。2017年11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而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30年来,一大批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

的本土体育研究工作者肩扛重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任,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并将“盛世修志”的文化传统融入到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之中。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原生于各个民族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仪式中的地方性身体运动,逐渐成为全民健身、娱乐消费、非遗保护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成为彰显文化自信、谱写时代篇章的主旋律。但是,从学科理论体系的自洽性、学科制度建设的逻辑性、一流学科评价的标准化、学科管理职能的多元化等方面出发,民族传统体育学虽然能体现出较强的本土特色,但是很难与世界一流接轨并获得学术话语权。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学要以学科创新为方向,完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软、硬件条件;以治理理论为依托,注重民族传统体育社会组织建设;以基层需求为导向,推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利用;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国际合作;以健康中国为目标,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幸福感;以生态思维为指针,注重民族传统体育内生环境营造,通过共同参与和协商合作的治理方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创新发

参考文献

- [1] 白晋湘,刘少英,龙佩林.拓展研究视域推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东方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综述[J].吉首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24(3):87-89.
- [2] 白晋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
- [3] 白晋湘.中国古代体育项目志(少数民族部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1.
- [4] 陈江,沈寓实.追梦空间——网络、金融与中国机遇[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81-83.
- [5] 陈振勇.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6:1-4.
- [6] 范周.读屏时代的文化思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100-105.
- [7] 方李莉.“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352-357.
- [8] 冯颜利,唐庆.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EB/OL]. (2017-12-12).<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7/1212/c40531-29702035.html>.
- [9]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 [OB/OL]. (2009-07-2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7/23/content_11761312.htm.
- [10]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授予博士学位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简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0-81.
- [11] 胡庆龙,杨建设.那达慕体育文化与旅游[J].体育文化导刊,2008,(6):89-90.
- [12] 李梦华.落实民族政策发展民族传统体育[J].中国民族,1981,(9):2-3.
- [13] 李伟听.全民健身指导手册[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486-488.
- [14] 刘仲林.跨科学导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68.
- [15] 卢亮球,招乐辉.体育学研究生教育研究比较与借鉴[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0-41.
- [16] 邱均平,祖文玲,赵蓉英.2017—2018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与结果分析[J].评价与管理,2017,15(4):1-6.
- [17] 体育经济司.体育总局关于印发《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OL]. (2016-06-27).<http://www.sport.gov.cn/n319/n4833/c733613/content.html>.
- [18] 万义.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历史发展研究[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1,35(6):61-65,83.
- [19] 王丛虎.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建设健康中国的路线图[EB/OL]. (2017-10-13).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710/23/content_41778254.htm.
- [20] 王旭光.我国体育社团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3.
- [21] 新华社.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EB/OL]. (2016-07-14).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14/content_5091040.htm.
- [22] 信春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198-204.
- [23] 杨冬梅.创新社会治理需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J].学习月刊,2014,(2):9-10.
- [24] 叶桂仓.制度性危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新趋向[J].江苏高教,2018,(5):7-12.
- [25] 余小波.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质量与保障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3:137-140.
- [26] 张涛.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7-10.
- [27] 张武保.商务英语专业与学科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45-46.
- [28] 中国体育博物馆,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780.
-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2010年)[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10:711-712.
- [30] MCCLELLAN J E. Science Reorganized: Scientific Societie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xvii.